

# 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

李越深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晚明时期,松江地区出现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社——几社,它除了聚集文士研习制艺举业之外,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云间词派的生成和兴盛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1)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一种互动关系。(2)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几社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磨词艺的最佳场合,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从而为清词的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几社;云间词派;唱酬风气;衍生物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3-0143-06

晚明时期,全国出现了众多的文社,既有复社这样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文社的基本职能是聚集士子研习制艺举业,其运作模式是:定时或不定时聚会,命题做举业文章,并且在适当的时间刊刻社稿。各文社又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政治色彩鲜明,有的文学风气浓厚。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性文社这种以浓厚的亲缘、地缘为纽带的文化团体,除了聚集文士,砥砺文章,生产出大量的社稿之外,还极大地推动了乡邦文化尤其是地方文学的发展,它往往成为某一地区文学兴盛的重要因素和背景。明末清初江南环太湖地区众多的地域性词派,就是在当时江浙地区文社隆盛、科举文化兴旺发达这样一个背景下勃然兴起的。地处松江的云间词派在明清之际的词坛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被学界看作是清词中兴的导夫先路者,它的产生和兴盛就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云间词派本身就是几社的衍生物。本文将着重以几社与云间词派的关系为切入点,来考察云间词派生成、发展的部分原因。

## 一、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

创立于崇祯初年的松江几社,是复社中的一个地方性小组织。复社以“娄东二张”为领袖。崇祯元年(1628)张溥以选贡生入都,张采成进士,“娄东二张”因此名震天下。当时复社主张扩大阵营,四处联络同道,而各地方文社出于对复社举业的认同以及“二张”的名人效应,亦纷纷汇集到复社的大旗下。崇祯二年(1629),几社先是成立于松江,稍后与其他许多地方文社一样,并入“娄东二

[收稿日期] 2003-07-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来源] 浙江大学董氏基金项目(205000-U20102)

[作者简介] 李越深(195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和明清词研究。

张“主盟”的复社。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指出,复社的组织是在一个大社之内有许多小组织,对外是用复社的名义,对内是各不相谋的。也就是说,复社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倾动朝野,但其实是一个松散型组织。除了在研习制艺举业的基本职能方面与复社保持一致之外,各地方文社又各具独立性,有自己的办社宗旨和特点。崇祯二年以后,几社与复社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复社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当崇祯二年复社成立时,张溥曾做过很多工作。如:“为之立规条、立课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庶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1〕(p.485)复社讲学问,也讲气节品行,以继承东林事业为己任,评论时政,抨击阉党。相比较而言,几社在办社宗旨及政治倾向上都不如复社旗帜鲜明,显得较为矛盾和暧昧,我们从杜登春的《社事始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矛盾和暧昧。兹引有关文字如下:

戊辰会试……先君中副车,与诸下第南还相订分任社事,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仰副去邪崇正之新主。于是乎天如、介生有复社国表之刻,复者,兴复绝学之义也,先君子与彝仲有几社六子会文之刻,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娄东、金沙两公之意主于广大,欲我之声教不讫于四裔不止。先君与会稽先生之意主于简严,惟恐汉、宋祸苗以我身亲之,故不欲并称复社,自立一名,尽取友会文之实事;“几”字之义于是寓焉。〔2〕(p.4)

……然几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淡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以声应气求之事悉付之娄东、金沙两君子,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2〕(p.6)

在同一篇文章前后相隔不远的文字里,对几社办社宗旨和政治态度的表述却前后矛盾。前面一段讲明“相订分任社事”的目的,一是为促进举业,二是为重振东林事业,辅佐新主崇祯帝“去邪崇正”。此外,还将几社之“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和复社之“兴复绝学之义”并列出之,归于一辙,以表明几社的宗旨与复社十分接近。但后面紧接着就改变前说,声明结社是为了取友会文,政治上欲避害远祸,不问朝政得失,又竭力把几社与复社区别开来。这种矛盾和暧昧的表述透露出几社办社宗旨的多元取向以及与复社的离合关系。当几社欲加入复社时,必然得认同复社“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宗旨,何况几社中如夏允彝、陈子龙等人本来就是复社骨干,作为个人来说,其政治倾向与“娄东二张”无异。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社团,几社的生存状态与复社又有明显的区别。复社除了辞章制艺之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被世人目为“小东林”,而几社则政治色彩较淡,更近于纯文社类型。即使是纯文社,几社也并不专力于制艺。李雯《蓼斋集》卷三四《会业叙》云:

今年春,郎公、卧子读书南园,余与勒卣、文孙辈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文孙曰:“即我南园之中,我数人之所习为制科业者,集而广之,是亦可以志一时相聚之盛矣。虽然,今天下徒以我等为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町岸,然为跃治者,以自异于世,而不知其局促淹困相守一方,是区区者盖亦有所不免也。”〔3〕(pp.500-501)

这段写于崇祯八年(1635)的文字,从侧面反映出几社当时制艺举业与诗酒风流并举的事实。几社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崇祯四年(1631)和五年(1632)是几社早年社集会课的高峰期,也是陈子龙等人于古文辞的时期。陈子龙自撰《年谱》云(崇祯四年)“试春官,罢归。”〔4〕(p.646)“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间以诗酒自娱。”〔4〕(p.647)崇祯五年“集同郡诸子治古文辞益盛,率限日程课。”〔4〕(p.647)王沅《春藻堂宴集序》云:“先是辛未陈黄门卧子、夏考功彝仲、宋太守尚木、彭司李燕又、杜职方仁趾同上公车,与吴中徐詹事九一、杨孝廉维斗、张庶常天如、吴祭酒骏公、豫章杨太史伯祥、彭城万孝廉年少诸公,会于京师,拟集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会社职方、张庶常、吴祭酒、杨太史登第,黄门四公报罢。归,乃与同里周太学勒卣、徐孝廉公、李舍人舒章、顾征君伟南、宋待诏子建、朱郡丞宗远、王文学默公,共肆力为古文辞。”〔4〕(p.647)几社文人治古

文辞的成果，便是刊刻于崇祯五年的《几社壬申合稿》。该文稿有张溥、杜麟征、姚希孟序，杨肃、徐凤彩题辞，陈子龙为撰凡例。文稿收入了李雯、彭宾、陈子龙、朱灏、徐孚远、顾开雍、夏允彝、宋尚木、周立勋、王元玄、宋存标 11 个人的作品，包括赋、古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排律以及各体文，刊行以后颇为天下所称。《几社壬申合稿》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众多社员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当时几社人置身其内的文学生存环境。

频繁的社集为文学活动创造了极佳的时空条件，换言之，云间一地文人的唱和多依赖于几社的社集活动。才子们热衷于“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而这种风气恰恰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几社成员既然能“建毫颖，振雄藻，立期赴的，动盈卷素”（杜麟征《几社壬申合稿序》）<sup>④</sup>（p. 756），进行诗词创作活动，那么推而广之，通过社集进行词的创作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几社和云间词派在人员构成上多互相交叉，即几社中有云间词人，云间词派中有几社成员。如果把《几社社会义》五集以后产生的许多别派均视作几社后起而归入几社，将其成员均算作几社人，把几社人和云间词人放在一起比对，这个事实就非常清楚。据粗略统计，具有云间词人和几社成员双重身份的就陈子龙、夏允彝、李雯、宋存标、宋徵舆、张安茂、钱谷、王广心、张一鹄、单恂、包尔庚、李长苞、周茂源、蒋平阶、吴骥、计南阳、卢元昌、韩范、杜登春、夏完淳、许缵曾、沈荃、徐允贞、张彦之、林子襄、朱灏、邵梅芬、彭师度等数十人。施蛰存在《蒋平阶及其支机集》一文中谈及几社与云间词派的关系时说：“在词这方面，以陈子龙为首的机（几）社同人也极为重视……机（几）社词人，多数是云间人，他们的词成为一个新兴流派，被称为云间词派。”<sup>⑤</sup>（p. 222）当然，云间词人不全是几社成员，几社成员也不全是词人，但云间词派与几社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关系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互动关系，两者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 二、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几社成立以后，经历了一个由专攻举业到兼顾文学的转变过程，刊刻于崇祯五年的《几社壬申合稿》标志着转变的完成。“几社六子”中最早登贤书者为杜麟征和夏允彝，两人又同赴崇祯元年的会试，因此，当崇祯二年几社成立之初，其主事者实为杜、夏二人。杜登春《社事始末》对此述之甚明：“先君与彝仲谋曰：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文会，并与讲明声应气求大法旨，情谊感孚比亲兄弟。”<sup>②</sup>（p. 5）几社最初的职能与一般文社无异，无非是社友相聚，旧学新采共为熏陶，研习制艺举业。当时复社有国表之刻，几社有六子会义之刻。所谓“国表”、“会义”即社稿，是各社取友会文的成果。在崇祯四、五年之前虽也有人作古文辞，但一般是个人行为，而《几社壬申合稿》却是集体行为的结果。《几社壬申合稿》杜麟征序云：“文章起江南，号多通儒，我郡为冠……昔余守故里，从诸子游，经术之外，古文间作。天才所骋，溢为骚赋，然未见其相聚而为之也。”<sup>④</sup>（p. 755）王云《春藻堂宴集序》亦云：“我郡之有古文辞也，自崇祯壬申昉也。”<sup>④</sup>（p. 647）《几社壬申合稿》显示了几社风气的转移，预示着明末云间地方文学兴盛局面的到来，云间词派就是在几社浓厚的文学风气中生成的。而在风气转移中，陈子龙个人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几社创立之前，陈子龙就已蜚声士林。他于天启五年（1625）结识周钟，天启七年（1627）结识张溥、张采、杨维斗、徐九一等，与这些复社元老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并于此期间加入复社<sup>①</sup>。崇祯元年，四方文人燕集弇州山园，复社人与艾南英围绕着王、李之学展开了一场辩论，时卧子年少气盛，与艾南英辩难时颇折其威风。本以诗歌古文著称于世的陈子龙，此时又因弇州山园辩难而名噪士林。

崇祯二年，陈子龙与另五人共同创立几社，但他真正扛鼎几社则是崇祯三年（1630）中举以后的

<sup>①</sup> 从天启到崇祯，复社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称呼也几经变化，崇祯二年起称“复社”。为叙述方便，本文统称为复社。

事。《社事始末》云：“国表初刻已尽合海内名流，其书盛行，戊辰之房稿莫之与媲。几社会义止于六子，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隼，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2〕〔p.5〕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科举文化的一个现象，即各社社稿往往因社中成员的金榜题名而走红。崇祯元年，张溥以选贡生入都，张采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复社国表之刻因此成为天下制艺的典范。而到了崇祯三年，“几社六子”中的陈子龙、彭宾同时领乡荐，几社会义之刻遂立即赢得市场。陈子龙原本就以复社骨干的身份、精通经史和诗古文辞的才子形象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于崇祯三年中举之后更是名闻天下。几社初创时的主事之一杜麟征于崇祯四年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崇祯四年、崇祯五年几社会课盛时正供职于京师。到了崇祯六年（1633）杜麟征丁母忧归，不久即卒。周立勋、徐孚远当崇祯四年、崇祯五年时尚未取得功名。彭宾虽与陈子龙同为崇祯三年举人，但此前一直在松江以教书为生，知名度不高。因此，到崇祯四年、崇祯五年，几社真正的盟主当属陈子龙和夏允彝。夏允彝长于经义，诗词非其所擅，陈子龙则自幼好为诗古文辞。从这些事实看，崇祯四年、崇祯五年间几社开始转变风气，由专治举业变为兼治诗古文辞，其倡导者实非陈子龙莫属。

作为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亦发挥着关键作用。“几社六子”中，杜麟征、徐孚远、彭宾、周勒卣四人未见有词作传世，夏允彝以经史见长，虽有词作但数量不多，且无专集。而陈子龙专于倚声之道，吟咏不绝，留下《江蓠槛词》和《湘真阁存稿》两部词集，分别收入《幽兰草》和《倡和诗余》。无论是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还是在词坛的活跃度、影响力方面，都惟有陈子龙才足以担当起云间词派盟主的重任。在陈子龙的带动和影响下，云间词派遂得以生成和兴盛起来。

陈子龙、李雯、宋徵舆合刻的词集《幽兰草》昭示了云间词派的确立。确认一个词派是否形成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一个创作群体，其成员之间有往来唱酬活动；二是要留下物质成果，即要有一定数量的词作传世。“云间三子”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小团体，《幽兰草》所收大多为三人唱和之作，因此，至《幽兰草》结集，形成云间词派的必要条件已完全具备。崇祯七年（1634）春至十年（1637）冬，是“云间三子”过往最密、吟咏唱和最多又最集中的时间，《幽兰草》大部分作品即产生于这个时期。作为核心人物，从“云间三子”文学小团体的形成到《幽兰草》的产生，陈子龙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 三、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

云间词派的形成固然以《幽兰草》为标志，但一个词派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形成的，此前必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笔者认为，云间词派的酝酿期大约在“天启、崇祯之际”五年以后至“云间三子”全部订交的崇祯七年。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去考察。

首先看几社的词学人才储备。以陈子龙与同郡人士交游而言，据其自编年谱，天启五年（1625）始交夏允彝、周立勋、顾开雍、宋存标、宋徵璧、彭宾、朱灏；天启六年（1626）始交陈继儒、董其昌；崇祯二年（1629）始交李雯。《几社壬申合稿》收入李雯、彭宾、陈子龙、朱灏、徐孚远、顾开雍、夏允彝、宋徵璧、周立勋、王元玄、宋存标 11 个人的作品。以上这些人中，夏允彝、宋存标、宋徵璧、朱灏、陈继儒、董其昌、李雯、王元玄均或多或少有词作传世，除董其昌、陈继儒外，另几人都是陈子龙的同辈词人。这表明在几社早期已经拥有一定的词学人才储备。其次看创作事实。彭宾《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二宋倡和春词序》云：“忆二十五年前，大樽方弱冠。自叹章句之学，束于世资，蹉跎十年，不得恣意作诗。间于余私分一韵，依仿古则，挥写情性。余尔时食贫授徒，既乏敏质，又鲜专功，遂使风雅之道凌轹前后者，以让吾友，至今恨之。大樽憎予之懒，喜舒章之勤。若子建、尚木，年齿虽不大远，而同人之工于倚声者，宋氏最先，则推为前辈矣。既复得辕文，大樽见其拟古诸篇，踊跃狂叫，自此劈笈开袞，赠答流连，赋咏之余，尽醉永夜。然大樽每与舒章作词最盛。”〔6〕〔p.345〕彭宾在

谈到陈子龙结识宋辕文一事时,仅言及大樽对辕文拟古诸篇的欣赏,未涉及其词的创作,而在前谈到宋子建、宋尚木兄弟作词最早,在后谈到大樽与李雯作词最盛,其间亦未提及宋徵舆。这表明在“云间三子”互相唱和赋词之前,至少已经有宋子建、宋尚木、陈子龙、李雯在进行词的创作。

彭宾这段文字回忆了崇祯初年的文坛往事,但这些往事到底发生于何年则并无清楚的交代,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推算。彭宾云:“大樽方弱冠。自叹章句之学,束于世资,蹉跎十年,不得恣意作诗。”大樽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弱冠年应为天启七年(1627),不过当时人往往将“弱冠”一词泛化,有时二十多岁也称为“弱冠”。卧子于天启二年(1622)十五岁时开始师从王元玄学习诗赋,后推十年约为崇祯四年至五年。彭宾又云“大樽每与舒章作词最盛”,似指当时陈、李已有词的交往,但究竟始于何时,彭宾未提及,至今也未见其他可靠的资料。然而李雯开始作诗的时间是有据可查的,李雯《蓼斋集》卷三四《陈卧子属玉堂诗叙》云:“二十出,与卧子交,又三年而始学作诗。”[3](p.494)同卷《水让居稿叙》亦言自己“年二十少知读书”;“又三年而慕古文词,学作古文,又一年而慕诗赋,学作诗赋。”[3](p.496)。李雯与陈子龙订交于崇祯二年《陈卧子属玉堂诗叙》所言“又三年”即崇祯四年至五年,两人年龄相仿而李稍大于陈,据《水让居稿序》所言推算,“学作诗赋”也在崇祯四、五年。按常规,古人总是作诗先于作词,据此李雯开始作词应该是在崇祯五年以后。我们还知道,崇祯六年是陈子龙与李雯二人诗赋唱和最多的一年,或许陈、李的词学交往就始于本年。

崇祯四年至五年是几社风气转变的一个关键时间,社集活动频繁,诗文唱和极盛,彭宾回忆中的文坛往事大体上即发生在此时。举业之暇、诗文之外,萌生出新的词学生命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信实的结论尚需得到可靠的文献资料才能得出。李雯和宋徵舆大约订交于崇祯六年,至崇祯七年,“云间三子”全部订交,于是便有了三子的赋词倡和之举,最终结集成《幽兰草》,昭示着云间词派的确立。可以说,云间词派的形成与几社的创立在时间上相差并不远。

云间词派存续了约半个世纪。在此期间,词派的创作成果累累,除了众多的词人专集之外,还有《幽兰草》、《倡和诗余》、《支机集》和《三子诗余》等合集,前三种至今尚存于世。另有一部刊刻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清平初选后集》,该词集虽不全是云间词人的作品,但由于操选政者多为松江人,且入选者中松江籍人数及作品数所占比重较大(计词人110家,作品566首,作品数几占全书的近二分之一),因此,一向被看作是云间词派的重要选本。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浙西六家词》刊行,以后随着朱彝尊词名日隆和《浙西六家词》的广为流播,浙西词派逐渐蔚成大派而盛行于天下,云间词派遂融入浙西词派,如“吴中七子”中的王昶、赵文哲、黄文莲均为松江人,归属于浙西词派。

关于几社的发展演变历史,杜登春《社事始末》和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叙述甚详,此不赘叙。需要强调的是,自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始,几社逐渐分裂出许多别派,先有求社与景风社之对峙,后有雅似堂、赠言社、昭能社、野腴楼、西南得朋会、原社、恒社等相继打出各自的旗号。这些派别大多由几社成员或其门人、子弟主持,如雅似堂由周茂源主持,赠言社由彭宾主持,西南得朋会由杜登春、夏完淳主持,等等。尽管后来派别众多,但地方文社特有的家族、师友纽带使各社之间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何况各社还时常分分合合,因此,我们还是应当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几社及其衍生的派别一直存续至入清以后。宋徵舆《振几集序》中的一段文字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曩者文字之盛推娄东、金沙,我郡稍后起,然天下称云间学,辄洒然变色改容,若有不可几及者。其故何耶?诸君子中天材最雄者,无如陈给谏卧子……诸君子往矣,硕果不食,燕又、伟南与尚木伯氏巍然如鲁灵光。伯氏有犹子曰楚鸿,盛有才藻,于是相与合英俊之彦,复修故事,取近日会业合而梓之,名之曰《振几集》。中间作者或耆宿魁艾,或豪迈特出,或为诸家子弟,然皆互相推奖,济济雍雍,有从先之思,无凌厉之习。[7](p.300)

宋徵舆此文写于入清以后,时几社元老夏允彝、陈子龙等人俱已亡故,彭燕又、顾伟南、宋尚木尚存于世,宋楚鸿(思玉)等新进与众耆宿魁艾仍汲汲于会业,刊刻社稿,“振几”一词顾名思义,即重

振几社之雄风也。直至康熙初年清政府禁社事,几社(包括其衍生的派别)方消亡。从晚明崇祯初年到清康熙前期的几十年内,云间词派与几社有较长时间的重叠存续期,了解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对几社与云间词派的互动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云间词派是在晚明江浙地区文社隆盛、科举文化兴旺发达这样一个背景下生成的。在陈子龙的领导下,几社为松江地方文学的振兴搭建起一个平台。就词学而言,几社的存在为许多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磋词艺的最佳场合,也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从而为清词的中兴打下良好的基础,几社于此功莫大焉。

### [参 考 文 献]

- [1] 陆世仪. 复社纪略·卷一[A].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 杜登春. 社事始末[M]. 清道光年昭代丛书道光本.
- [3]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1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 [4] 施蛰存, 冯祖熙. 陈子龙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 词学编辑委员会. 词学·第2辑[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 [6]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7册[M].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7] 宋徵舆. 林屋文稿·卷四[A].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5册[M].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 An Introduction to Jishe Society and its Cloud School of Ci-poetry

LI Yue-she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Ming Dynasty (1628 – 1644) saw the emergence of a well-known literary group in the Songjiang area of East China's Shanghai. Known as Songjiang Jishe or Jishe Society in Songjiang, this organization brought together local scholars to engage in academic studies of preparations for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o create a literary atmosphere, thus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ocal literature. Another group deriving from Jishe Society was called Yunjian Cipai or Cloud School of Ci-poetry. These two literary groups developed side by side while enhanc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Firstly, Jishe Society provided the Cloud School with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in which ci-poetry would develop healthily, while the Cloud School remained interactive with Jishe Society. Secondly, Chen Zilong, the leader of Jishe Societ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oud School. Of all the noted scholars in the society there was only Chen Zilong who made continued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poetry in terms of practical p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thereby establishing himself in ci circles. So, it was none other than Chen that was fully qualified to lead the Cloud School. Thirdly, Jishe Society and the Cloud of Ci-poetry grew together for a considerably long time. The society served as the most ideal place where ci-poems could be composed, discussions about the art of composing poetry be carried out, and poets be stored and developed. In this context, the Cloud School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Songjiang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ci-poetry in the Taihu area in east China and laying down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rising of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Jishe Society; Cloud School of Ci-poetry (Yunjian Cipai); composing and replying in poems; derivative